



毛泽东

龚国基◎著

MAO ZEDONG YU ZHONGGUO
GUDAI SHIREN DE XINLING DUIHUA

与中国古代诗人的
心灵对话

文
献出版社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 诗人的心灵对话

龚国基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诗人的心灵对话 / 龚国基著. - 2 版.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073 - 3723 - 5

I. ①毛… II. ①龚… III. ①毛主席诗词—研究

IV. ①A841.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0478 号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诗人的心灵对话

著 者: 龚国基

责任编辑: 孙 翊

封面设计: 杨 群 欧阳显根

责任印制: 寇 炫

出 版: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网 址: www.zywxpress.com

邮 编: 100017

发 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 010 - 68423599

邮 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排 版: 北京方方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787 × 1092mm 16 开 25.25 印张 305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2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73 - 3723 - 5 定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导论：千古诗人有知音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诗人的心灵对话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兼诗人，是历史上罕见的诗人政治家、政治家诗人。他的政治功绩和诗词成就，都是无与伦比、举世公认的。

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是有着二千多年诗歌传统，产生过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大诗人的诗词大国。诗人毛泽东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诗歌渊源。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直到晚年，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古典诗词。他潜心学习、研究过中国古代灿若群星的诗人词家及其难以计数的诗词作品。他以强烈的爱好，全身心地涵泳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以诗家的情感和语言，与上下数千年的众多古代诗人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心灵对话。毛泽东是千古诗人诗心相通的知音。

毛泽东崇高的精神品格、光辉的思想理论、非凡的政治实践、卓越的领导艺术、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杰出的诗词创作，都曾受到中国古典诗词肥田沃土的丰富滋养，与中国古代诗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之，毛泽东对中国古代诗人的人格精神、思想理论和诗词艺术的深刻领悟、精辟评论、批判继承和发扬光大，使之升华到更高的全新境界，光耀当代中国的

天空。

毛泽东与古代诗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探寻和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古代诗人之间多方面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对于毛泽东诗词乃至毛泽东生平、思想的全面、深入研究，无疑是一种新的发掘和开拓。《毛泽东与中国古代诗人》一书，是从毛泽东的生平、思想和诗词创作等多方面与中国古代诗人的联系这个侧面，对政治家诗人、诗人政治家毛泽东进行研究。

中国古代诗人最热心最忠实的读者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强烈的爱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贺子珍回忆，在井冈山时期，《唐诗三百首》他几乎能全部背诵。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藏书约有9万册，其中诗词占有相当比重。《诗经》、《楚辞》、《全唐诗》、《唐诗三百首》以及历朝各家著名诗人、词人的专著、选集、别裁都有收藏。据曾参加整理毛泽东中南海故居藏书的张贻玖统计，在这些藏书之中，毛泽东亲自圈画、批注过的诗词曲赋计1590首，涉及诗人429位。至于他读过而散失在各地的诗词和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诗词，都无法统计在内。这部分究竟有多少，很难完全统计。有人估计，毛泽东一生读过的各种诗词至少在2000首以上。

毛泽东读中国古典诗词，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博览兼容，视野广阔

从上古谣谚开始，到《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传诵名篇与不大著名的佳作，各种不同流派诗人各种不同内容、体裁、风格的作品，

毛泽东都尽收眼底。

2. 特别看重具有民主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诗人的作品

屈原的《离骚》、白居易的讽喻诗、刘禹锡的咏史诗，以及张元干、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的爱国诗词，毛泽东读得最多最熟，经常吟诵、书写。

3. 偏爱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也注意阅读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

毛泽东对古代浪漫主义诗人情有独钟，屈原、李白、李贺、李商隐等诗人的浪漫主义作品，他读得最有兴趣，予以很高的评价。同时也读了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诗人的许多佳作。

4. 读词偏重豪放派，也兼读婉约派

毛泽东曾说：“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他特别欣赏豪放派代表作家苏轼、辛弃疾的词，对辛弃疾的词圈画得最多，同时，也读了不少李煜、柳永、李清照、秦观等婉约派词人的作品。

5. 口不绝吟，细读精研

毛泽东读中国古典诗词，对于优秀的作品常是“三温四复”，许多名篇都能背诵，并终生不忘，能随时凭记忆手书全诗，随手引用其中的名句。对于一些诗人的作品和生平，毛泽东像职业学者那样，不厌其详地加以考证、研究，并提出独特的见解。如他对晋宋时期诗人谢灵运、唐代诗人王勃、贺知章等的生平身世及有关作品，就作过十分详细的考证和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

6. 手不停挥，圈画评点

毛泽东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读诗尤其如此。他在读过的诗词标题和字句的旁边和天头上，常随手画着大圈、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诗人的心灵对话

小圈，或写下批注，对作品进行评点，提出许多精辟的观点。

毛泽东是中国古代诗人最热心、最忠实的读者，是中国古典诗词最优秀的鉴赏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毛泽东终生孜孜不倦地阅读、研究中国古典诗词，使他能集众家之长，具有深厚的诗词素养，对中国古代诗人及其作品十分熟悉。这是他评点和运用、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诗词的前提条件，也是他的诗词创作能够取得超越古代诗人杰出成就的坚实基础和深厚渊源。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诗人的精辟评说

毛泽东圈阅中国古典诗词，写下了大量的批语。他在与身边工作人员、子女、友人以及外国来宾、朋友等的谈话中，也常对中国古代诗人进行介绍和评说。在他的批语和评说中，有许多独到而精辟的见解，给人以深刻的启发，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继承，发扬古代优秀文艺传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1. 作为政治家诗人的独特评说角度

毛泽东不是一般的诗词爱好者和评论家，他是伟大的诗人，又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革命领袖和国家元首。因此，他在阅读和评说古代诗人及其作品时，总是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来加以审视，更多地考虑政治和现实的需要，吸取那些有益的历史经验，以其“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采取不同的态度。

毛泽东高度评价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主要是因为敬佩屈原的崇高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认为屈原“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是“敢讲真话的人”，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

导论：千古诗人有知音

“批判恶君”，指出屈原创造的“骚体”“有民主色彩”，“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

他欣赏曹操的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但对曹操的评价，首先还是从政治上着眼，肯定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功绩，“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他肯定杜甫的诗“是政治诗”。

他指出白居易诗的高处在于“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作品中表达普通老百姓的情绪和愿望”。

他读纳兰性德词《蝶恋花·出塞》，写下“看出兴亡”四个字的批语。

这些评论，都表现出政治家的独特眼光。

2. 既重视思想内容，也看重艺术形式

毛泽东爱好中国古典诗词，正因为古典诗词艺术性高。他曾说过：“我们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他对艺术性高的作品特别看重。

李白的《蜀道难》是描写蜀地雄伟险峻山川的千古称绝的写景名作，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让人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他称赞白居易的《琵琶行》“文采好，描写得逼真细腻”。这首长诗他能把全诗背下来，数次挥毫书写都是一气呵成。他读《琵琶行》竟至边读边流着泪水。可见都是为这首诗的高度艺术性所感染。

3. “知人论世”的评论原则

毛泽东评说古代诗人诗作，不是单纯论诗，常是首先考察诗人的生平经历，结合诗人的身世来评论其作品。他评点谢灵运诗《登池上楼》，写下100多字的批注，通过诗中“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两句，结合身世挖掘其内心世界，分析作者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实质，揭示其内心矛盾，指出他的矛盾是“想做大官而不能”，“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而且这一矛盾支配了他一生，最后“矛盾达于极点”，以至“晚节造反”，导致自我毁灭。

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写下一条达1000多字的批注，分析其作品说：“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

他对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罗隐《嘲钟陵妓云英》等诗，都有这种知人论世的批注评说。

4. 有个人偏好，但注重公正评价

毛泽东对古代诗人及其作品有个人的偏爱，对不同风格的诗人和作品的评价，则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

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毛泽东偏爱李白诗的浪漫主义风格，他对李白有很高的评价。他曾对孩子们赞赏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他在同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到中国文学时说过：“李白（8世纪）——唐代杰出诗人。他像天才诗人普希金对俄国人民的贡献那样，为中国人民写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诗篇。李白的诗是登峰造极的，他是空前绝后的不朽艺术家。”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杜并

导论：千古诗人有知音

称。韩愈说过：“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毛泽东把杜甫和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相比，更喜爱李白的作品，曾说过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但是艺术欣赏趣味的偏好，并不影响他对杜甫的诗作客观公正的评价，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他不但读过不少杜诗，很多杜诗名作他都能背诵，而且对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样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同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的谈话中评论杜甫说：“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代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文学遗产。”毛泽东对杜甫的崇高评价，是公正的、科学的。

同样，对于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毛泽东虽然不喜爱他的作品“哭哭啼啼”的风格，但同样称赞他“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写出精彩的文艺作品”，“在作品中表达普通老百姓的情绪和愿望”。

对文学史上褒贬不一的韩愈，毛泽东则认为“一分为二为宜”。这种评价，也是客观公正的。

5. 对一些诗人的独特推重

有些在文学史上并未引起重视的诗人及其作品，毛泽东在广泛的阅读中以自己敏锐、独到的眼光，发现其艺术光彩，给予应有的评价或特别的推重。

明朝李攀龙的诗，一般人未必注意到，而毛泽东在两部《明诗别裁集》中，圈画过李攀龙诗22首，称赞说：“我觉得李攀龙有些诗写得不错。”

高启是明朝一个有成就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受到重视，但以往未见有特别高的评价。毛泽东却称高启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对高启这样高度评价，毛泽东还是第一个。

中国古代诗人与毛泽东的人格精神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高尚人格精神的历史伟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特别注重学习中国古代英雄人物的思想情操。在研读中国古典诗词中，他对古代优秀诗人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爱国爱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心忧天下的道德胸襟、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以及高尚的审美情趣等崇高的人格精神，有着深切的体会和强烈的共鸣，受到深深的感染和熏陶。

1. 崇高的爱国情怀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熟读并抄录《离骚》，为屈原伟大的爱国精神所激励，立志报效祖国和人民。

表现强烈而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伟大爱国诗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精神，韦应物《寄李儋元锡》的名句“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所抒写的“古代清官的胸怀”、“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陆游《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所抒发的念念不忘恢复失地、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感，以及岳飞《满江红》词、文天祥《过零丁洋》诗高扬的“收拾山河”的英雄气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等等，都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崇高评价。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忧国忧民，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献身革命事业，终生身体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爱国爱民的人格精神，显然受到中国古代诗人爱国主义传统精神的深刻影响。

2. 不屈的战斗精神

中国古代许多优秀诗人，生活在腐败黑暗的封建统治时代。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往往受到压抑。在他们的诗词作品中，鲜明地表现着一种追求理想和自由的不屈的战斗精神。毛泽东对古代诗人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自由不懈斗争、绝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精神，表示赞赏和崇敬。

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光辉峻洁的人格，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刘禹锡“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傲视权贵、不屈抗争的精神等等，都深为毛泽东所赞许。

古代诗人这种不屈战斗精神对毛泽东的影响，鲜明地表现在他一生万难不屈的革命实践中，也表现在他的刚劲雄拔的诗词创作中。

3. 高尚的审美情趣

中国古代诗人的许多优秀作品，描绘多姿多彩的大自然，赞美祖国神奇壮丽的锦绣河山，以高尚的审美情趣，表现诗人开阔博大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情怀。毛泽东十分喜爱这类作品，不仅陶冶了自己高尚的审美情趣，而且常将这样的优秀作品推荐给党内同志和亲人友人。

李白的名作《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对登庐山所见壮丽景色作了极精彩的描绘，读之使人心旷神怡，壮思遐想。毛泽东对此诗特别欣赏，尤喜爱其中描写庐山壮观天地的四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曾书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还在给病中的儿媳刘松林的信中抄写李白这四句诗，并嘱咐说，读这样的古典

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

中国古代诗人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诗歌理论

中国古代诗人的优秀作品中，体现着作者先进的文艺思想和创作经验。有些诗人并曾提出鲜明的创作主张，留下诗歌理论著作。毛泽东精心研读历代诗人的优秀作品和诗论著作，吸取其精华，总结其艺术经验，运用于自己的文艺理论和诗歌理论创造。他的关于文艺、关于诗歌的许多论述，都与中国古代诗人的创作和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1. “为人民大众”的创作方向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第一个在诗论中鲜明地提出诗歌要“为民”而作并身体力行的，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毛泽东对白居易诗歌的人民性和通俗化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的谈话中，谈到白居易时赞赏说：“他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写出精彩的文艺作品，尽管他在宫廷身居高位，但是仍然接近群众，并在作品中表达普通老百姓的情绪和愿望。”

白居易在其重要诗论著作《与元九书》中，响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并针对社会时弊特别强调“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他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等讽喻诗名篇，即是其“为民”而作诗歌主张的体现。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古代诗人先进的文艺主张发扬光大，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诗词即是“为人民大众”而创作的文艺思想的形象体现。从“为民”到“为人民大众”，可以看到毛泽东

文艺思想与白居易诗歌理论一脉相承的联系。

此外，这种联系，还体现在通俗化、大众化的诗歌语言主张。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提出：诗歌要“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力求通俗平易，以便于老百姓阅读和传播。白诗平易浅切，妇孺能解，成为中国古代开一代诗风的著名通俗诗人。毛泽东特别赞赏白诗的通俗，从延安时期以来，大力提倡诗歌的通俗化。他自己的诗词既高雅，又通俗，常以大众口语入诗，因而能家喻户晓。由此亦可见毛泽东与白居易多有诗心相通之处。

2. 形象思维的艺术规律

毛泽东针对以往流行的否定形象思维的观点，鲜明地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的重要理论观点。其理论依据，不仅在于总结了古代诗人的诗歌创作规律，而且直接引用古代著名诗人的作品来加以论证。

1965年7月，毛泽东在与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毛泽东在此论述“诗要用形象思维”的观点，既从正面引证了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表现手法“赋、比、兴”的运用，以及注重形象思维的“唐人规律”，即唐诗的创作规律；又从反面引证了从唐代诗人韩愈“以文为诗”开始的违反形象思维的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诗人的心灵对话

诗歌表现手法，指出宋代诗人多数不懂得诗要用形象思维的道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毛泽东深入研究总结了中国古代诗人正面和反面的创作经验，他的“诗要用形象思维”的重要理论观点，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即“唐人规律”的高度概括。

3.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在中国诗歌史上，存在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屈原、李白是我国诗歌史上浪漫主义流派最杰出的代表，杜甫是现实主义流派最优秀的代表。毛泽东既重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又提倡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1938年，他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口号。1958年他又明确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相对于苏联时期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无产阶级创作方法，毛泽东强调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将革命的浪漫主义摆在与革命的现实主义同等的地位。

“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也是与中国诗歌发展的传统和古代诗人的创作经验相联系的。毛泽东既重视中国古代的现实主义诗歌，更喜爱屈原及唐代“三李”的浪漫主义诗歌。在1958年1月16日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针对当时忽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倾向指出：“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他认为，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要破除迷信，大胆创造，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善于幻想。因此，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发展的经验，提出了“革命的

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4. 两派“应当兼读”的艺术欣赏法则

毛泽东关于婉约、豪放两派的词“应当兼读”的论述，就是在读过北宋著名词人范仲淹的词作之后写下的。

我国的词，自晚唐五代到宋代，逐步形成婉约与豪放两派：柳永、李清照为婉约派的代表，苏轼另树豪放一派。范仲淹的词，则处于由婉约到豪放发展过程中承先启后的一环。1957年8月1日，毛泽东读过范仲淹的《苏幕遮》、《渔家傲》两首词，兴之所至，挥笔抄写了这两首词，并写下一段长长的批语，表述了他读范词的感受。他写道：“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为什么要“两派兼读”呢？毛泽东又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和阅读心理学的原理，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

毛泽东这一篇从读古代词人作品的感受而引发的论述，将个人阅读的体验上升到艺术欣赏规律的理论高度，不仅对个人的诗词阅读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艺术欣赏和阅读学的研究，也具有理论价值。

毛泽东诗词对中国古代诗人的继承和超越

毛泽东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批判继承者。他运用中国传统诗词的旧形式，赋予现代生活的全新内容，创作了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诗人的心灵对话

诗人郭沫若称赞毛泽东诗词：“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诗人柳亚子推崇毛泽东诗词：“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毛泽东诗词之所以能取得千古独步的创作成就，除了毛泽东自身的天赋因素和特殊的生活经历之外，还在于他善于从中国传统诗词的长江大河中汲取源头活水，借鉴灿若群星的古代诗人创作经验的精华，并加以创新，为传统诗词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将中华诗词推向现代新的高峰。

毛泽东对古代诗人的继承和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诗言志”的优秀传统

“诗言志”出自我国古籍《尚书·尧典》，指出诗歌是用来表达襟怀抱负的。它是我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也是我国古代诗歌一以贯之的传统。从屈原的《离骚》、陶渊明的田园诗，到杜甫的忧国忧民诗篇、陆游的爱国主义杰作……无不抒写崇高的爱国精神和峻洁的人格襟怀。

毛泽东诗词继承和发展了“诗言志”的优秀传统，赋予时代的、阶级的全新内容：言人民大众之志，抒人民大众之情。他的改造旧世界、建设新天地的远大理想，救国救民的高尚情操，奋斗不息的英雄气概，坚韧不拔的乐观精神，以及对待爱情、亲情和友情的革命情怀，无不在他各个时期的诗词中得到生动的体现。

德国学者卜松山在研究了中国古典诗词和毛泽东诗词之后，发现了杜甫诗对毛泽东诗词的影响。他在《毛泽东诗词：形式的意义》一文中写道：“（毛诗与杜诗）它们之间也有共同点：他们都具有‘政治上的参与意识’。杜诗中充满儒家式忧国忧民的精神，与其相对应的是毛诗中的民族革命热情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比较分析，提供了毛泽东诗词继承和